

略談中日文化交流與日本大學中的漢語教育

霍 有明・魚 小輝

歷史正處於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交接點。當人們回顧二十世紀的一百年間的歷史時，可以發現，在中日兩國之間已出現過兩次大規模的文化交流。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化交流，發生在本世紀之初，可說是中國學習日本。當時，大批的中國留學生前往日本，而且人數不斷增加。據有關資料統計，僅1906年一年，派遣人數就竟達8,000人之多。截至1919年，中國已共有6萬多留學生前往日本。①在這些留學生中，許多人既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創造者，同時也是中日近代文化和文學關係的建造者。如魯迅，蘇曼殊，周作人，錢玄同，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歐陽予倩，夏衍，胡風，周揚等，幾乎都是在明治末期和大正時代先後留學日本。有論者指出：“他們在當時或後來走向文壇並創造出歷史業績，雖然不能說完全是由於留學日本，但至少可以說，留日的經歷構成了他們生活和創作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②這一次大規模文化交流的結果，是“近代中國的文化”“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③第二次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則始於八十年代之初，在中國改革和對外開放以後。這一次交流的特點，與第一次有極大的不同，表現為兩國都有大批留學生相互留學，因而可稱之為對等的交流。例如，據平成7年（1995）5月1日統計，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人數達24,026人（大陸地區），占留學生總數53,847人的44.7%。④僅筆者所在的信州大學，中國留學生人數就達140人。⑤而據日中留學協會1996年10月的統計，日本當時在中國留學的長期留學生亦達6,313人。半年未滿的短期留學生，總計6,000人左右。這些日本留學生，分佈在中國大陸的一百五十餘所大學學習。⑥目前，這一次大規模中日文化交流的勢頭正方興未艾，無疑會持續發展而進入二十一世紀。

—

文化交流的內涵可說極為廣泛，而一種語言對外來語彙的吸收，同樣屬於文化交流的具體表現。

在本世紀初的第一次大規模中日文化交流中，除了大批中國留學生留學日本以外，大批的日文書籍也被譯介到中國。這些譯書，在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翻譯日文書籍所帶來的一個最顯著的文化現象，是大量的日本近代詞彙在漢語當中的流行。”⑦筆者在這裏只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直面”一詞，就是由魯迅先生在文章中率先使用。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魯迅先生曾指出：“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⑧這一段話，是魯迅先生的名句，在中國現代和當代均有很大的影響。故其中的“直面”一詞，也廣為流傳，至今使用頻率仍很高。僅以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文藝報》1998年的幾篇文章為例：

1995年出版的小說《穆達伊娜》直面人生，痛責時弊，對馬里，非洲大陸乃至整個第

三世界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對其受教育階層的西化，異化，奴化現象予以了揭露，筆鋒犀利。(1998年10月8日《文藝報》第2版)

這篇小說有點直面當下生活的味道，寫的是貧困鄉村孩子讀書的問題，因為師資缺乏，少女向紅就成了與她差不多大的學生的老師。(1998年1月13日《文藝報》第1版)

直面社會，直面人生，是有責任心，有出息的藝術家應有的素質。(1998年1月13日《文藝報》第3版)

同樣，在八十年代之初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的中日文化交流中，隨着大量中國留學生留學日本，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面的頻繁交流，一些日語詞彙又進入漢語而開始流行。仍以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文藝報》1998年的數篇文章，報道為例：

在衆多的明星出書熱中，楊鈺瑩獨辟蹊徑，將自己多年的美容心得和實踐付諸於文字，寫出了一部頗具特色的美顏物語。(1998年10月8日《文藝報》第4版)

這是我第一次拍寫真集，公司投入了很大力量，也許幾個月之後才能正式拍攝。但前期的工作現在就已經開始了，比如場景的遴選，服裝的設計，風格的安排等等事務。(1998年2月14日《文藝報》第3版)

原計劃拍兩個月，可最終却拍了一年多，……拍了1萬多張照片，最後入選寫真集的祇有400張。(1998年4月11日《文藝報》第3版)

為紀念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20周年，增進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日本廣播協會的合作關係，促進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日本NHK交響樂團將於1998年11月28日在北京世紀劇院舉行北京公演，……此次演出活動由日本放送協會，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上海市廣播電影電視局主辦。(1998年9月12日《文藝報》第3版)

柯尼卡複印機，邁虎步新登場，風風火火銷九洲。(1998年5月30日《文藝報》第2版)

1997年底，柯雲路的新作《發現黃帝內經》尚未出版，便由《深圳風采週刊》先行轉載，很快在深圳引起巨大反響，成書全面登場後，胡萬林這位被稱為“當代華佗”的主人公立即為衆多的患者，讀者關心，追尋。(1998年3月7日《文藝報》第1版)

由於“粥少僧多”，義賣巴老的書只能臨時改在小會議室中進行，……因此，在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內顯得人氣特別旺盛。(1998年9月18日《文藝報》第1版)

與拉丁語等純粹表音語系間的交流影響不同，漢語和日語間的交流影響自有其獨特之處。

上舉“物語”等日語中詞彙在漢語當中使用和流行的有趣例証^⑨，亦可反映出當今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

二

在八十年代之初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教育則應說是其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

據前引日中留學協會1996年的統計材料，1996年10月時，在中國大陸的外國長期留學生（留學半年以上）總數為18,336人，其中，日本留學生人數為6,313人，分佈在北大，復旦等一百四十餘所大學。從這一材料來分析，日本留學生人數佔留學生總數的34%，超過了三分之一。

又據日本《月刊交流》1995年10月号發表的調查報告，近年來，日本國內選修漢語的大學生也在迅速增加。1995年，選修漢語作為第二外語的新生佔新生總數的37.6%，比上年增加4.2%。^⑩1997年末，日本明海大學鑒於漢語在當代日本的使用和教育正處在不斷上昇的勢頭，通過積極籌備，並獲得日本文部省批准，在1998年春成立了日本大學院中第一個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的應用語言學研究科。該校在該研究科語言教育門類中首次設立了漢語教育專業，其中開設兩門課程：“中國語教育教材特論”和“中國語教育教法特論”。^⑪

再對信州大學近年共通教育的履修狀況加以攷察。在外國語科目中，除英語為第一外國語外，尚有德語，法語，西班牙語，中國語，韓國語，俄語等六門外語作為第二外國語供學生選修。從平成八年（1996）共通教育外國語科目的履修狀況來看，六門外國語A的履修人數共計1,962人。其中，德語A1的履修人數為779人，佔第二外國語總履修人數的40%；法語A為268人，佔14%；西班牙語A為220人，佔11%；中國語A則為480人，佔總履修人數的24.5%。^⑫信大履修中國語學生人數的這一比例，雖然還明顯低於日本《月刊交流》95年所公佈的平均37.6%的水平，但仍顯示出其在六門第二外國語選修人數比例中位居第二的實力。這一事實，也顯示出信大共通教育外國語科目內中國語教學的重要性，以及改進中國語教學方法，完善中國語教材的迫切性。

下來，筆者先從“交際文化”的角度就如何改進中國語教學略抒己見。

兩種文化交流時必然有文化差異，從而給交流造成困難，所以有學者提出重視“交際文化”的問題。中國有學者指出：“所謂交際文化，指的是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在交際時，由於缺乏有關某詞，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識而產生誤解。這種直接影響交際的文化知識就屬於交際文化。”^⑬還有學者認為：“所謂‘交際文化’，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隱含在語言系統中的反映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是非標準，社會習俗，心理狀態，思維方式等跟語言理解和語言使用密切相關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因素。”^⑭那麼，這種因交際文化知識不足所造成的交流上的困難，也必然體現在中國語的教學當中。在此，筆者僅談幾個這兩年在信大講授中國語會話課程中出現的“交際文化”的問題。

一，關於見面打招呼的問題。見面打招呼是人們交流的一種重要方式，但文化的背景不同，打招呼的話題也會不同。日本人見面打招呼時最常見的說法是：“（您）身體好嗎？”或者是：“今天天氣真好。”諸如此類。而中國人過去見面打招呼時常見的說法則是：“喫過（飯）了嗎？”按照日本人的理解，就會認為對方是邀請自己去喫飯。至於付款的方式則可能是由對方掏錢請客，或者是雙方共同付錢。這就是由於不理解漢語環境中這句話有双重功能：它除了詢

問之外，還具有問候的功能，是人們外出相遇時打招呼的一個常用的話題。這正如日本人常說的“（您）身體好嗎？”一樣，也具有雙重的功能：既可作問詢話來使用，也可作問候話來使用，祇是視環境不同含義也不同而已。當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見面打招呼的話題也日益泛化。如見面時互道“你好”，即是受了西方外來語的影響。即使是“喫過（飯）了嗎？”這一過去常用的話題，也開始區分具體場合和時間使用。因此，中國語教師在給日本學生上中國語會話課時，則應當着重闡明異文化環境中打招呼話題的具體功能。

二，關於打電話的問題。生活在今天的信息社會，打電話已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在中國，打電話的開始情況會是這樣：

（打電話人撥號，綫路接通……）

接電話人：喂？

打電話人：張處長在嗎？

接電話人：張處長不在。

在日本，打電話的開始情況則會是這樣：

（打電話人撥號，綫路接通……）

接電話人：（這邊）是東方公司。

打電話人：張部長在嗎？

接電話人：承蒙關照。張現在不在。

兩相對照，則可反映出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文化方面的心理差異來。日本人在接電話時，一拿起電話先“自報家門”，告訴對方自己是什么單位。此外，儘管打電話人找的是本公司的張部長，但接電話人回答對方時却不能把張也稱為“部長”，否則失禮的，反映出日本人“外尊內卑”的習慣和觀念。而中國人在接電話時，通常祇先說一個“喂”，應聲即算是打過招呼（即使是一些服務質量較高的賓館，機關或無綫尋呼臺等，總機話務員也祇是以“你好”來代替“喂”），接下來則是等打電話人報出“家門”，或是道明來意。此外，接電話人回答對方，將張也同樣稱為“部長”。反映出中國人“客貴主尊”的習慣和文化觀念。因此，在給日本學生講授打電話的“情景對話”時，則有必要講清其中所表現出的中日間的文化差異，使日本學生與中國人交流時不致產生“失禮”的誤解。

三，關於稱呼的問題。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人們的社會交往中，各種各樣的稱呼層出不窮，如“先生”，“女士”，“小姐”，“老闆”，“老總”等，但“同志”這一稱呼仍有其頑強的生命力，在不少場合仍有相當的使用頻率。在中國，“同志”這一稱呼，可說有着古老的中國文化之蘊涵。其最初是指志趣相同或志趣相同的人。如《國語·晉語四》：“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後漢書·劉陶傳》：“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後引伸為政治理想相同的人，如近代孫中山先生之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又成為同一政黨的成員相互間的稱謂。當代更引伸為中國公民彼此之間的一般稱呼。然而，當今的日本漢語課本似乎將其與某種政治因素聯繫起來，大多都不使用這一稱呼，如白帝社出版的暢銷書《生活中國語對話300句》中，即完全未見提及，這並不符合漢語文化的實際。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著名教授相原茂先生等編著的《話說北京——中國文化·中國事情》教材，在第一課的課文和對話中雖出現了“同志”的稱呼，却不加注釋，而與此同時，對“師傅”和“售票員”却作了詳細的解釋。實際上，從“同志”這一詞彙的本義來看，同志乃同心同德，志同道合之意，完全是褒義。即使在今天，中國老百姓聽到這一稱呼時，通常也會覺得有平等，溫暖，親切之感。一個學漢語的

外國人，如果不知道或不正確使用這一稱呼，在某些場合與中國人交往便可能出現困難。

接下來，筆者再從文化史的角度及政治，經濟的角度，就當今日本大學所使用的中國語教材的編寫談些看法。

據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組織的“外國人學習與使用漢語情況調查”課題組的1993年的報告，一項對來中國留學的外國人的學習目的調查表明：“為瞭解中國”排在首位；“從事外交外貿工作”位居第二；“從事翻譯工作”與“為學習專業做語言準備”百分比接近，居於第三；“從事漢語教學與研究”則排在最後。“為瞭解中國”的選擇人數佔總人數的38.7%。這說明，該項目對於學習中高年級漢語的外國人來說，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對於選擇者來說，‘瞭解中國’既是他們學習漢語的目的，也是學習漢語的動機之一。他們的學習目標，主要是以漢語為媒介，瞭解中國的過去與現狀，瞭解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歷史與文化。”^⑮保坂律子女士1995年11月對日本東京都範圍內八所大學選修漢語的411名學生曾做過一次問卷調查，其調查結果也顯示，日本大學生在回答選修漢語的理由時，“對中國，對漢語有興趣”是排在首位，佔總人數的45%，與中國國家漢辦組織的“外國人學習與使用漢語情況調查”的結果基本相同。^⑯

由以上的調查結果來分析，在為日本選學漢語的大學生編撰教材時，必須要考慮他們想通過學習中國文化來瞭解中國的這種需求。從筆者所採用和瀏覽過的日本白帝社，朝日出版社，白水社，金星堂等出版社的幾十種中國語教材來看，其中只有白帝社出版的《中國文化史漫步》，朝日出版社出版的《話說北京——中國文化·中國事情》，金星堂出版的《中國的文化與傳統》等幾本教材在介紹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方面較有特色。但是，這些教材是將中國的文化知識分成文字，書法，雕塑，繪畫，工藝，城市，詩詞，戲曲，樂舞，節日，教育，發明，氣功，食品，姓名等各種專題來介紹，長處是以分門別類的辦法來滿足日本學生瞭解中國文化的興趣，既集中又較能深入，但不足之處則是歷史為文化專題所切割，使學生難以學習到較系統的中國文化發展史。希望將來能有這樣的教材面世。

當前，在日本大學裏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趨向，即越來越多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將興趣轉移到外資企業上。如東京的一個外資說明會，參加的學生即可達一萬人。^⑰在這種形勢下，日本學生對綜合國力不斷提高而又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中國也自然逐漸注重。

據上引保坂律子女士所作的問卷調查，在四個年級共計411名學生中，那些想參加或已參加過漢語檢定考試的學生，一年級學生中有33人是為考查自己的漢語實力，有28人是認為可能有助於就業；二年級學生（已開始進入專業學習階段）中有3人是為考查自己的漢語實力，有11人是認為可能有助於就業；三年級學生中有5人是為考查自己的漢語實力，有2人是認為可能有利於就業；四年級學生中有4人是為考查自己的漢語實力，有4人是認為可能有利於就業。這一結果說明，在學習漢語的學生中，有不少人的目標是為具備與中國人交流的能力，或有利於就業（包括面向中國的外資企業。中國已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出口國，日本也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出口國。^⑱筆者所教過的學生，有的畢業後即在從事日中貿易的工作）。因此，為適應學生們的這種需求，大學中國語教材則應適當增加有關中國近年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新詞語和文章的內容。自中國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政治，經濟新詞語湧現出來，例如：入關，接軌，九五，浦東開發，洋浦模式，希望工程，增值稅，五個一工程，菜藍子工程，三通一平，三沿開放，翻兩番，深圳速度，三資企業，財政包干，下海，下崗，股份制，涉外價格，出口退稅，市場調節價格，等等。如果學生們不理解這些詞語的政治，經濟，文化含義，

不懂得這方面內容的文章，就較難提高與中國人廣泛交流的能力。

注：

- ① 見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轉引自趙樂甡主編《中日文學比較研究》一書第182頁，中國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 ② 見趙樂甡主編《中日文學比較研究》一書第182頁。
- ③ 郭沫若《日中文化的交流》。
- ④ 見日本國際交流研究所編撰《日本》第32號第33頁，1992年12月1日發行。
- ⑤ 日本長野縣學生交流推進協議會編撰《信州留學生交流》1996年3月第6號第14頁。
- ⑥ 參日本日中留學協會編集《中國留學情報》1997年號第14—17頁，1996年10月20日發行。
- ⑦ 趙樂甡主編《中日文學比較研究》第183頁。
- ⑧ 見《魯迅全集·華蓋集續編》。
- ⑨ 按，有些日語詞彙如“寫真”，“登場”等與漢字書寫可說相同，但意義和用法則不同。
- ⑩ 見日本《月刊交流》1995年10月號刊登的《全國事務系大學生·第二外國語選擇狀況調查結果報告》。轉引自保坂律子《日本大學生漢語學習情況調查》一文，中國《世界漢語教學》雜誌1998年第2期第106—110頁。
- ⑪ 引自中國《世界漢語教學》雜誌1998年第2期第12頁。
- ⑫ 見信大共教第136號文件《平成8年共通教育相關授業科目履修狀況的通知》，平成9年3月13日。
- ⑬ 張佔一：《談談漢語個別教學及其教材》，見黎天睦《現代漢語教學——理論與實踐》，中國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
- ⑭ 呂必松：《對外漢語教學發展概要》，中國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
- ⑮ 轉引自《對外漢語教學與文化》一書第250頁，中國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 ⑯ 見保坂律子《日本大學生漢語學習情況調查》一文，《世界漢語教學》雜誌1998年第2期第107—108頁。
- ⑰ 參1998年11月14日日本《朝日新聞》上《私（立）大（學）連携召開外資說明會》一文。
- ⑱ 參三瀨正道等著《時事中國語教科書》第24頁，日本朝日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